

“90 一代”城市新移民

与

当地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状况比较

——以上海市为例

□ 徐浙宁

摘要: 对 80 名 10-14 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及上海本地 121 名同龄青少年的家庭教育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 (1) 新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显著低于上海市本地家庭, 家庭收入低、父母受教育水平低等社会经济因素直接影响到新移民家庭对子女的成就期望与情感关注; (2) 新移民家庭对子女的学历期望、成就鼓励、情感理解等显著低于本地家庭, 对子女的控制显著高于本地家庭, “低期望”、“高控制”、“少情感理解”等养育方式不利于子女的健康发展; (3) 新移民家庭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显著弱于本地家庭, 新移民的道德发展值得关注。

关键词: 城市新移民; 家庭教育;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家庭教育功能; 养育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流动人口外出打工出现“家庭化”趋势, 他们将子女带入城市上学、生活或在城市中结婚、生育, 流动人口的子女日益成为城市的新一代移民^{[1][2]}。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的教育关注与城市融入, 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而在众多相关研究中, 家庭教育问题无疑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却又不能被忽视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家庭教育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中无疑是最为关键和基础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人口流动中家庭取代个体成员而成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发轫, 还因为家庭是流动人口子女城市化的初始环境, 提供了子女进入城市后的社会化基础条件^[3]。本文希望通过相对全面的家庭教育问卷, 对本地青少年与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进行比较, 发现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家庭教育特点及影响因素, 为当前关注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实项目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 并采用 SPSS14.0 进行数据处理。

调查工具为自编问卷与标准化量表, 其中自编问

卷内容包括: 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身份信息, 如姓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等; 基本生活状况, 如经济条件、居住条件等)、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期望、亲子互动等; 分为父母卷与子女卷两套。标准化量表主要采用(1)家庭教育功能问卷(修订): 该问卷由包蕾萍、徐浙宁两人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基础上修订而成。主要包括情感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道德性和控制性等 6 个方面的家庭教育功能, 共 54 道题目, 由父母填写。(2)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 该量表是 1980 年由瑞典 Umea 大学精神医学系 C.Perris 等人共同编制的、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问卷。本研究采用岳冬梅等人修订的中文版 EMBU, 共 66 题, 其中“父亲养育方式”包含了 6 个因子(①情感温暖、理解; ②惩罚、严厉; ③过分干涉; ④偏爱被试; ⑤拒绝、否认; ⑥过度保护), “母亲养育方式”包含了 5 个因子(①情感温暖、理解; ②过度干涉、过度保护; ③拒绝、否认; ④惩罚、严厉; ⑤偏爱被试)。由孩子填写。

调查有效样本为出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市某区某民工子女学校 80 名 10-14 岁青少年及其父母, 以及选取同区某普通中小学 121 名 10-14 岁学生及其



父母作为对照样本。

研究结果

1. 新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显著低于上海市本地家庭，普遍为非独生子女家庭

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是家庭教育的物质基础，结果显示：新移民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条件、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状况等均显著低于上海市本地家庭。新移民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普遍在 500-1000 元，上海本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普遍在 1000-3000 元；人均月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新移民家庭比例远远多于上海本地家庭。新移民家庭的住房面积，平均为 42.70 平方米，上海本地家庭平均为 75.99 平方米；且新移民家庭子女 76.9% 无独立房间，本地家庭子女 62.9% 有独立房间。就住房周边环境而言，新移民家庭周边的“安全性”令人担忧 ($\chi^2=8.78$, $p<.001$)，24.1% 的新移民父母认为居住周边环境“不安全”，而上海本地父母仅 7.3% 认为“不安全”。新移民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为“初中或同等学历中专”，上海本地儿童父母普遍为“高中或同等学历中专”；且前者“大学或以上”比例仅 1.4%，而后者为 22.2%。新移民的父母中 11.5% “无工作”，而且主要以个体经商或打工为主，本地儿童的父母多有固定工作。另外，82.7% 的新移民家庭为非独生子女家庭，而 93.0% 的上海本地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具体见表 1。

2. 新移民家庭更重视子女的“身体健康”，对子女的高学历期望显著低于本地家庭

从“家庭教育观念”来看，新移民家庭所认同的成功家庭教育标准依次为：子女的“身体好” (45.6%)、“心理健康” (17.6%) 和“道德品质好” (14.0%)；而本地家庭所认同的依次为：子女的“心理健康” (29.7%)、“身体好” (28.4%) 和“道德品质好” (26.7%)。相比较而言，新移民家庭显然更关注子女的“身体健康”。就对子女的学历期望而言，38.5% 的新移民父母只期望孩子“高中毕业或读到大专”，61.5% 的父母期望孩子有“大学或以上”学历；而本地家庭中 77.3% 的父母期望孩子能读到“大学或以上”，该比例显著高于新移民家庭 ($p<.01$)。

3. 新移民家庭对子女的成就鼓励和道德教育显著低于本地家庭，对子女的控制显著高于本地家庭

从“家庭教育功能问卷”分析 (见表 2、图 1)，新移民家庭与上海本地家庭在实际的家庭教育中，主

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差异显著：

表1：新移民家庭与上海本地家庭的基本情况比较

	新移民家庭	上海本地家庭	差异性检验
家庭月人均收入 (%)			
500元以下	24.8	3.8	$\chi^2=13.02^{***}$
500-1000元	35.5	28.1	
1000-3000元	23.4	47.7	
3000元以上	16.4	20.5	
住房条件			
(1) 平均住房面积 (m ²)	42.70	75.99	$t=3.96^{***}$
(2) 子女有无独立房间 (%)			
有	23.1	62.9	$\chi^2=3003^{***}$
无	76.9	37.1	
父母受教育程度 (%)			
小学或以下	39.1	1.8	$\chi^2=7943^{***}$
初中或同等学历中专	46.4	14.2	
高中或同等学历中专	13.0	61.9	
大学 (含大专) 或以上	1.4	22.2	
父母职业状况 (%)			
有固定工作	62.9	66.7	$\chi^2=11.76^{**}$
自由职业	25.7	21.3	
无工作	11.5	4.3	
退休	0	7.7	
是否独生子女家庭 (%)			
是	17.3	93.0	$\chi^2=21668^{***}$
否	82.7	7.0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以下同。

新移民家庭对子女的“成功性”教育显著低于本地家庭 ($p<.001$)。所谓“成功性”，即父母对子女在上学或工作中成就性或竞争性的要求与鼓励。也就是说，在新移民家庭中，父母更少对孩子的学习或成就提出要求，也更少该方面的鼓励。从具体的调查项目中，可以看到：相对于上海本地家庭，新移民父母“不太关心孩子的学业、升级等问题” ($p<.01$)、“对孩子是否获得成就并不那么积极” ($p<.01$)、“对孩子的教育，并不是尽力而为的” ($p<.01$)、更少“为了孩子有好的前途而竭尽全力” ($p<.01$)、更少“相信竞争是好事” ($p<.01$)。

新移民家庭对子女的“道德性”教育显著低于本地家庭 ($p<.05$)。所谓“道德性”，即父母对子女进行基本的社会礼仪、道德规范等教育。也就是说，在新移民家庭中，父母更少对孩子进行道德性教育与规范。从具体的调查项目中，可以看到：新移民父母对

表2: 新移民家庭与本地家庭的家庭教育功能比较 (M±SD)

	家庭教育功能					
	情感性	独立性	成功性	知识性	道德性	控制性
新移民家庭	4.09±1.88	5.89±1.58	6.09±1.42	5.63±1.72	6.95±1.68	5.14±1.85
本地家庭	4.00±1.49	6.24±1.46	6.93±1.25	5.47±1.91	7.40±1.31	4.50±2.07
t值	.38	-1.97	-5.08***	.73	-2.59*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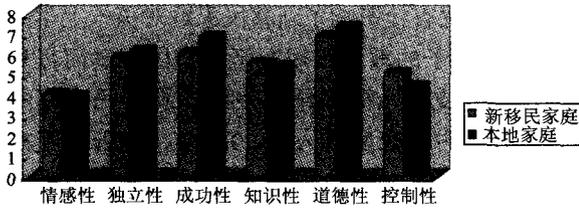


图1 新移民家庭与本地家庭的家庭教育功能比较

孩子在“敬老”(p<.001)、“维护公共环境卫生”(p<.01)、“遵循道德准则去办事”(p<.001)及“行贿受贿是不道德”(p<.01)等方面的教育均显著弱于本地家庭。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无论怎么样,离婚是不道德”的认同上,新移民家庭显著高于本地家庭(p<.001)。这一结果表明:新移民家庭在城市化生活中面临很多的道德认同危机,但传统的“从一而终”的婚姻家庭观念相对稳固,这对于在城市中保持家庭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移民家庭对子女的“控制性”显著高于本地家庭(p<.01)。所谓“控制性”,即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控制,是使子女学会适应规则(尤其是家规)的家庭教育功能。也就是说,在新移民家庭中,父母更要求孩子“听话”,对孩子违反家规的行为更加严厉。从具体的调查项目中,可以看到:相对于本地家庭,新移民父母“更多强求孩子遵守家规”(p<.05)、“家庭中做事情更坚持固定的方式”(p<.05)、“更强调要遵守

表3: 新移民家庭与本地家庭的父亲养育方式比较 (M±SD)

	父亲养育方式					
	情感温暖、理解	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	偏爱被试	拒绝、否认	过度保护
新移民家庭	47.17±10.84	20.02±6.91	20.36±3.57	7.76±2.50	9.93±3.65	11.45±3.03
本地家庭	52.17±11.16	21.83±8.64	21.12±4.16	11.06±3.72	10.57±3.81	10.51±3.11
t值	-2.61*	-1.24	-1.11	-5.49***	-1.14	2.06*

表4: 新移民家庭与本地家庭的母亲养育方式比较 (M±SD)

	母亲养育方式				
	情感温暖、理解	过度干涉、过度保护	拒绝、否认	惩罚、严厉	偏爱被试
新移民家庭	47.36±11.65	36.91±10.06	14.07±5.42	14.24±5.68	7.66±2.35
本地家庭	52.84±11.62	37.30±6.33	14.50±5.52	15.08±6.73	11.20±3.75
t值	-2.83**	-.26	-.51	-.85	-5.87***

固定的生活规律和家规”(p<.01)、更要求“孩子夜间不可以随意外出,事先必须与大人商量”(p<.05)以及“家中的生活规律或家规更坚持不变”(p<.05)。

另外,研究还发现: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一致,对“家庭教育功能”六个方面的认同上,两组家庭父母间均无显著性差异;但两组家庭的父亲之间、母亲之间均在个别功能认同上有所差异。本地家庭中的“父亲”比新移民“父亲”更强调孩子的“独立性”(p<.05)和“成功性”(p<.001);本地家庭中的“母亲”比新移民“母亲”更强调孩子的“成功性”(p<.001),而新移民家庭中的“母亲”比本地“母亲”对孩子的“控制性”更高(p<.05)。

4. 新移民父母对子女的情感理解显著低于本地家庭,对子女更少偏爱

从“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结果分析(见表3、表4),发现:新移民家庭的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温暖、理解”和“偏爱被试”上与本地家庭有显著性差异,且两组父亲之间在“过度保护”因子上也有显著性差异。具体如下:

新移民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情感温暖、理解”均显著低于本地家庭(p<.05; p<.01)。也就是说,新移民家庭中,孩子更少感受到父母的爱与理解、接纳与支持。从具体的调查项目中,可以看到:新移民表示更少“感到父亲对我的喜爱”(p<.05)、更



少“觉得母亲允许我在某些方面有独到之处”(p<.01)、“母亲很少向我表示她爱我”(p<.05)以及“母亲更少允许我做一些我的朋友们做的事情”(p<.01)。

新移民家庭的父亲和母亲对所调查的孩子更少“偏爱”(p<.001)。也就是说,参与调查的新移民被试,相对本地儿童而言,更少觉得父母对自己“偏爱”(p<.05),并不觉得父母对自己有超越其他兄弟姐妹的喜欢或迁就(p<.01)。

新移民家庭的父亲对子女的“过度保护”显著高于本地家庭(p<.05)。“过度保护”反映出家长的养育焦虑,对孩子的行为常常会用“都是为你好”这样的理由来过度控制与限制。从具体的项目中,可以看到:新移民表示“父亲更少允许我做一些其它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害怕我会出事”(p<.01)。

另外,研究还发现:新移民家庭中,母亲对女孩的“拒绝与否认”显著高于对男孩的(p<.05)。说明在新移民家庭中,女孩的需求更少得到满足、更可能成为家庭事件的“替罪羊”或“出气筒”、更多受到母亲的指责与批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移民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念。

讨论与思考

1. 新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家庭教育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家庭收入与父母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对子女的成就期望与情感关注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家庭收入、父母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状况等众多家庭社会经济因素中,家庭收入与父母受教育水平对于家庭的“成功性”功能有预测性,即家庭收入越高、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则父母对于子女的成就期望及鼓励就越多。同时,还发现:家庭收入与父母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对家庭的“情感性”功能有预测性,即家庭收入越高、父母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越高,则父母越可能对子女给予情感关注与支持。而根据本研究结果,新移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父母受教育水平普遍是“初中”或“小学”,这样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显然会制约父母对子女的成就期望与情感关注。这一点从前面的研究结果中已经证实:新移民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高学历期望显著低于上海本地家庭,子女所感受到的情感温暖与理解也显著低于本地青少年。李伟梁(2005)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解释本研究结果,他认为:“流动家庭进入城市后,其经济功能便跃居首位,直

接导致家庭教育功能的削弱。流动儿童的家长整日忙于打工、经商,没有时间与精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对于收入不佳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就会出现下降、偏低现象”。而且,新移民的家长整日忙碌,也从客观上限制了与子女的情感交流与互动(赵娟,2003)。吴银涛(2007)的研究也指出,“家庭收入不稳定的状况直接影响了新移民家庭对孩子上学的支撑能力”。孩子的教育费用对于新移民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本研究结果表明,新移民家庭的子女教育开支占到家庭收入的29.87%,显著高于本地家庭的23.72%(p<.01)。因此,要改善新移民的家庭教育状况,必须结合其社会经济状况建立综合干预模式。

2. 新移民家庭的“低期望”、“高控制”、“少情感理解”、“过度保护”的养育方式不利于子女的健康发展,易使子女发生心理行为问题

家庭养育方式是父母在教育、抚养子女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是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的综合体现。研究表明,家庭养育方式对青少年的成就动机、学习成绩、行为、心理健康、自我意识、自信、自尊、自我效能等均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决定着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与行为,从而影响到子女的成就动机、能力发展和学业成就高低^[4]。对子女有较高期望的父母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更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而且更能够激励子女去努力,所以子女的成就动机会更强、对自身的能力更肯定、更追求学业成就。反之,对子女期望较低的父母则更少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对子女的学业成败表现出更多无奈或无所谓,则会降低子女的成就动机,使子女对自身的能力不确定,进而产生各种学业不良问题。其次,根据美国鲍姆令德(D.Baumrind)的“父母养育方式理论”,“高控制”与“少情感理解”是“专制型”养育的基本特征。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因为我说了,所以你必须这样做”。如果孩子出现稍许的抵触,这种类型的父母往往会采取体罚或其它惩罚措施^[5]。这一结果与赵娟(2003)的研究一致。这种类型的养育往往只考虑到成人的需要,而忽视和抑制了儿童自己的想法与独立性。因此,儿童一方面会因为父母严厉而表现出“顺从”、“听话”的适应性行为;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害怕做错事被惩罚而减少探索性行为,表现出较多的焦虑与社会退缩。而对于10-14岁青春过渡期的孩子而言,“专制型”养育容易引

发孩子的逆反,进一步破坏亲子之间的情感连结。当然,在本研究中,新移民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高控制”与其居住的环境也有密切关系($p < .05$),新移民家庭的居住环境普遍较偏僻、不安全因素较多,所以也从客观上增加了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性”。再次,众多 EMBU 的研究发现,“少情感温暖、理解”和“过度保护”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有显著性相关。答会明(2002)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孩子的自信、自尊、自我效能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p < .001$);而“严厉的惩罚”、“过分的拒绝、否认”及“过度保护”则易使孩子缺少自信、敏感以及过分地否定和贬低自己^[6]。蒋奖(2004)、沈鉴清等(2006)研究发现,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与孩子的焦虑强迫、攻击性、违纪等不良行为呈显著负相关($p < .05$),而“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与孩子的不良行为呈显著正相关($p < .01$)^{[7][8]}。也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少、“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等越多,孩子则越可能发生不良的心理行为问题。另有研究发现,“少情感温暖、理解”与“过度保护”与神经症、边缘型人格等都有显著性相关^{[9][10]}。综上所述,虽然本研究没有做家庭养育方式与子女心理行为等相关研究,但从众多已有研究中可以推断:新移民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低期望”、“高控制”、“少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等养育方式,显然不利于子女的健康发展,易使子女发生心理行为问题。

3. 新移民家庭面临城市化的道德认同危机,新移民的道德教育值得关注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移民父母对孩子诸如“敬老”、“维护公共环境卫生”、“遵循道德准则去办事”及“行贿受贿是不道德”等方面的道德教育显著少于本地青少年父母。这反映出新移民父母本身的道德认同危机,他们对于城市化生活中所要求的道德准则有很多认知模糊性。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这一状况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p < .01$)。相关研究指出,父母的道德认知及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与孩子的道德认知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流动儿童家长的道德认知水平更直接影响着子女的道德认知发展^[11]。因为流动人口家庭的流动性以及与城市社会的相对隔离性,使得流动儿童所接受并内化的社会规范、价值标准更多地受家庭教育影响。李悠(2003)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道德认知水平低于广州市常住儿童。因此,

尽管研究发现新移民家庭认同“道德品质好”是成功家庭教育标准之一,但因为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认同危机,很可能在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中误导,使“90一代”的新移民在城市化生活中出现道德发展问题,进而影响到城市整体的道德文明素质。

综上所述,“90一代”城市新移民的家庭教育,无论在社会经济条件,还是在父母的养育方式上都存在诸多不利于他们成长的因素。就目前而言,城市新移民的家庭教育基本局限在“家庭内部”,社会与当地政府的介入与干预还非常微弱(李伟梁,2005)。但事实上,这些新移民已经成为城市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与力量,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与稳定,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也将对城市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社会与当地政府有必要给予这些家庭外部的支持与援助,以改善其家庭教育状况,进而促进新移民的城市化融入与成长。基于以往研究,对改善新移民的家庭教育提出三点建议:

(1)将新移民的家庭教育融入到现有城市家庭教育指导体系中,加强新移民家庭的亲子教育。目前,上海等大城市都已经逐步形成了由市妇联牵头,学校、社会、儿保、工会、媒介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格局,利用学校或社区专门对0-18岁的儿童家长给予家庭教育指导,以改善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如果各级家庭教育指导机构能给予新移民家庭关注,引导新移民父母来参与相关的培训与活动,不仅能对新移民的家庭教育带来影响,而且能促进新移民家庭的城市社会融入。另外,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的居住也趋向稳定性,这从客观上增加了对他们进行社区管理和教育的可能性。

(2)改善新移民的学校与社区环境,促进新移民的心理健康与道德发展。尽管新移民的家庭教育中,存在不利于其心理健康与道德发展的诸多因素,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本研究中的“90一代”新移民,基本上处在“城市边缘状态”,他们的学校是偏离市区的“民工子女学校”,所居住的环境也是远离城市文化的郊区偏僻一带,这样的“封闭性”使得不良家庭教育方式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设法改善新移民的学校与社区环境,比如帮助新移民进入当地的学校就学、对其所居住的地域增



强安全措施等,使新移民能够接触到“外部”的积极影响。

(3)给予新移民家庭可能的经济援助与社会支持,使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经证实,新移民的家庭教育与其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显著的关联。很多新移民的父母并非不关心孩子,但出于生存压力而无暇与子女沟通交流。因此,政

府与社会若能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新移民家庭一定的经济援助与社会支持,比如:职业培训、工作介绍、最低工资限制等等,也将间接改善新移民的家庭教育。■

徐浙宁: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守建

参考文献:

- [1] 赵娟.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养方式的质性研究[J].青年研究,2003(8):15-22.
- [2] 吴银涛.城市新移民家庭教育影响因素探索——以成都市部分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为例[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33-35.
- [3] 李伟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3):1-7.
- [4] 张树东.成就动机、家庭影响力及学业成就的关系研究[J].教育学报,2007(3):59-65.
- [5] 桑标.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66-370.
- [6] 答会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自信、自尊、自我效能及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2(8):483.
- [7] 蒋奖.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J].健康心理学,2004(1):72-74.
- [8] 沈鉴清,吴惠娟,赵梅青.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行为和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2006(2):133-135.
- [9] 杨灿,施琪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亲附类型及其父母养育方式的研究[J].上海精神医学,2006(6):327-332.
- [10] 刘宝花,黄悦勤,宋燕华,张津尊.父母养育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与神经症关系的多因素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3):156-157.
- [11] 李悠.流动人口家庭环境对子女道德认知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J].教育导刊,2003(8-9):66-68.